

outside literature

文学之外

〔英〕托尼·本尼特
强东红等译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文学之外

Outside literature

〔英〕托尼·本尼特 著

强东红 等 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安新文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张红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之外/(英)托尼·本尼特 著;强东江 等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8

书名原文:Outside Literature

ISBN 978-7-01-016329-1

I. ①文… II. ①托… ②强… III. 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A81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8924 号

文学之外

WENXUE ZHIWAI

[英]托尼·本尼特 著 强东红 等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01-016329-1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中译本序

1990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不约而同地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思考和论述，这两本著作分别是由Blackwell publishing出版社出版的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和由Rouledge出版社出版的托尼·本尼特的《文学之外》。《美学意识形态》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分别出版，已经为国内学者所熟悉，《文学之外》直到现在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希望同样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

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随着20世纪70年代英国撒切尔首相执政和美国里根总统入主白宫，一种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思潮在哲学、文学、经济学和各人文社会科学逐渐形成，并成为学术界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及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学派的社会文化理论，包括美学和文学批评思想都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反对和驳难，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学批评也陷入某种程度的低迷状态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锋出现了进一步“美学化”的倾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对文学批评的功能和社会意义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重要问题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思考，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和托尼·本尼特的《文学之外》正是在这种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写作和出版的。

如果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是用一种回到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回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传统和雷蒙·威廉斯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的方式开启新的理论方向和理论探讨的话，那么托尼·本尼特是用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尔迪尔等欧洲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文化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功能、当代文学批评的对象和特征等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因此，关于新自由主义社会和文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和文学批评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果说特里·伊格尔顿是力图在一种“非阿尔都塞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作出重新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的话，那么可以说托尼·本尼特是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运用福柯、布尔迪尔等法国理论家的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对这些时代所提出的重要问题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作出分析和阐述。

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路易·阿尔都塞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将权利关系和文化产生关系中“主体的再生产问题”十分鲜明地提出来了，此后，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尔迪尔一直到阿兰·巴迪欧，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在主体问题和主体的再生产问题领域展开了持续三十余年的深入讨论，托尼·本尼特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功能这个角度，围绕“文学批评在主体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具有什么作用、这种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自由的存在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是否可能实现和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等问题，在一个新的学术视野下构建了他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在阅读这本理论著作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引发了我对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的复杂性、它与权力的内在关系、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等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作出许多思考，在我看来，托尼·本尼特的著作可以很好地开拓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的理论视野，在观念上和方法上从模糊不清的理论误区中走出来，从而真正开启我们自己的理论自觉。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或者说在今天“文化经济时代”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审美制度和文学制度是美学和文学批评研究的

前沿问题，也是一个理论上颇为困难的理论问题，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在我看来，这是当代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启蒙和情感解放的当代形态或者说当代文学表征方式。托尼·本尼特的《文学之外》在这个方面可以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重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话语是近年来中国理论界讨论得较多的话题，这当然是一个很宽泛也很复杂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有难点和关键点的话，我同意托尼·本尼特的看法，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方法来研究和说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话语与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说明文学怎样实现对于权利的抵抗，以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复杂而有机的联系，文学既不在文学之内，也不在文学之外，文学存在于社会的权利关系中，文学是这种关系的表征，同时也是对这种关系的抵制和挪用。

《文学之外》中，托尼·本尼特很明确地表示他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作为伯明翰学派的后继者之一，他的这个理论立场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也使我想起一件趣事。2008年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以“高级研究学者”的身份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合作导师正是特里·伊格尔顿。在曼彻斯特大学期间，我与特里·伊格尔顿作了比较深入全面的访谈，他向我介绍了英国以及欧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近况，也详细地谈了他最近的研究情况，我感觉到他的研究与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有些距离，因此我问道：“你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吗？”特里·伊格尔顿很明确地回答：“不，我不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两天以后，我又很意外地收到伊格尔顿通过邮局寄来的信，这在他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他在信中郑重地再次强调他不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十分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弄错了。伊格尔顿这个反应让我思考了很久。的确，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区别，我想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目标这个终极目标的坚持，而在后马

克思主义者那里这个目标淡化和模糊化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不再存在了。2009年，托尼·本尼特到南京大学从事学术访问，在我与他访谈时，他还谈到他读过特里·伊格尔顿的访谈，他表示他的确与伊格尔顿不同。

经过强东红等学者的认真努力，托尼·本尼特的《文学之外》中译本就要出版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在中国学者深入讨论重建中国文化话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是最为关键的维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没有当代性可言。在“文学之死”的议论具有越来越广泛影响的时代，托尼·本尼特的《文学之外》是一部值得认真阅读的著作，我相信对中国的文学理论界能够带来许多思考和启示。

是为序。

王 杰

于上海交通大学美学、艺术与文化理论研究所

2015年2月22日

译者序

托尼·本尼特 (Tony Bennett), 1947 年生, 是当代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他曾执教于英国开放大学 (1975—1983 年, 1998—2009 年) 和澳洲格里菲斯大学 (1983—1998 年), 担任过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基地主任, 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交流学院兼职教授, 2009 年后受聘于澳洲西悉尼大学, 担任文化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教授。

本尼特是一位非常活跃多产的学者, 自从 1979 年出版其成名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来, 有十多种著述在世界各地出版, 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文学之外》(1990)、《博物馆的诞生: 历史、理论与政治》(1995)、《文化: 改革者的科学》(1998)、《超越记忆的未来: 进化、博物馆与殖民主义》(2004)、《文化与社会: 托尼·本尼特自选集》(2007)、《批判轨迹: 文化、社会与知识分子》(2007)、《文化、阶级与区分》(2009) 和《建构文化与改变社会》(2013) 等。

《文学之外》是本尼特的代表性著作。在这部学术专著中, 受过社会学学术训练的本尼特, 在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和福柯学派理论占据上风的后现代语境下, 通过与各种模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对话, 而努力发展一种更加彻底的社会化和历史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他透彻地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发展一种关于审美特性的普遍性文论的倾向, 并指出这种唯心主义倾向妨碍了发展研究文学文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取而代之, 本尼特倡导对文学/社会关系领域进行非审美的理论分析, 并

勾勒了与审美决裂的一系列概念、方法和程序，从而使文学以一种更加具体特定的方式来面对政治现实问题而发挥实效。

《文学之外》大体上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文学的内外对立、审美特性、文化唯物主义、话语理论等），分析了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中普遍难题的关系，并倡导在历史的和唯物主义（不局限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还要吸取福柯主义、女性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的模式）前提下，发展一种关注文学的形式、功能和效果的历史社会学。这种社会学不像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把文本解释成是潜藏的社会实体的显现，而是认为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有机成分。

第二部分主要从文学与历史、文学体裁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形式的社会决定观的问题，指出与其把文学看成社会历史的反映，以对立的方式把文学与历史关涉起来提取意义，不如将其看成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本尼特看来，考察文学文本不是为了揭露它们在历史过去的社会关系方面说了什么，而应该是揭露它们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做了什么。在对体裁社会学进行批评时，本尼特提出了一种替代选择，即不是根据与社会历史相应的文本的内在形式特性，也不是根据家族相似的关系建构来对体裁进行界定，而是将其看成促成主体型构、有效地调节着写作和阅读的实践的的社会技术和社会场域。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美学关注（即，把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审美的书写，是文学生产的历史特定关系的产品）存在的问题，指出它们并没有摆脱哲学美学的影响。本尼特建议，应该把文学看成文本的使用和产生效果的历史特定和制度组织的领域，其本体身份不在于一系列审美的和形式的特性，而在于文本在自己本身就是组成部分的社会实践场中的使用和运用模式。这样，就不会把文本看成所谓的深不可测地存在的审美呈现，而是将其视为一系列可观察的社会的过程、现实和手段，它们在同一层面与其他实践领域相互影响。本尼特认为，马克思主义

文论不应该再徒劳地发展一种关于审美特性的文学理论，而是应该关注文本的局部的、临时的和事态的政治使用价值。本尼特指出审美在过去实际上与国家机器相类似，实质地影响了文学艺术教育运用的环境，成为个人形成技术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关注教育、培训和考核的制度楔入形式的发展，促成评价的训练、测试和形式的发展，从而把教师/批评家构成为技术上而不是道德上的榜样，并且把学生/读者带进获得特殊技术能力而不是道德纠正的过程。

第四部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指出了这种批评观只不过是一种宏大姿态政治学。本尼特以萨义德、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人为例，分析了他们所具有的把批评功能普遍化的倾向和视批评为纯抽象的、脱离现实的和脱离一切具体环境的实践行为的倾向，并指出其批评观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具有直接联系，而这严重制约了批评面对局部的、暂时的和具体的政治问题发挥实际作用。在本尼特看来，批评应该关注文学制度，文学制度不仅包括它们传播的批评话语的结构和内容，还包括如下的经常为人忽略的事物，如教师与学生、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具体系列关系，作为自我塑形机制的组成部分的具体阅读技术，影响知识分子阶层的生产和训练方式的考核评价的具体形式，等等。本尼特认为必须审视文本、评论和消费行为在其中进行的一系列特定的制度话语条件，因为，只有坚持这种唯物主义原则，普遍化的批评才能分解为一系列规划，才能展开针对不同的公众、制度和环境的不同的文本评论的实践，才能使穿行于各种各样的制度场所的文本评论发展为一系列更为现实可行、容易操作的实践。本尼特以自己在政府机构担任要职的经验指出，在政府之外或与其对立的空間构建所谓的反公共领域，让批评活动完全与政府的大一统统治进行对抗，只进行“为了心灵和灵魂的”意识上的战斗是难以产生实效的。批评家应该赞成提高政府作为文化赞助人的功能，因为它是唯一能够代表普遍利益而行动的行为者，同时又要利用政府为其担保的反对政府的自由在法则、规章、策略和战略的规划和制订（由此，行为得以调节、标准得以规范化、

竞争性的主张得以作出、方案得以规划和实施)方面而开展专业技能性的实践活动。

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学界来说,本尼特的学术主张和文学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照意义。某种程度上说,我国文论建设借鉴的更多的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是康德学派、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在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浓郁的无关乎社会历史的理想主义或唯心主义色彩,而缺乏当下现实的针对性和实践性。本尼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痼疾的分析,有利于我们走出纯文学艺术观的误区,克服文论建设方面的精英主义倾向,克服审美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分离。而且,如果能以本尼特的重视实践和策略性的周密规划的文学观为参照物,显然有助于深入贯彻在文论建设方面一直缺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意识,进一步深化美学和文论的社会历史化维度,也有利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政府机构的二元对立,而使拥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学者在面对当下的波澜壮阔的中国经验和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

最后,还应该对这本书的翻译说几句。伊格尔顿认为,《俄狄浦斯王》的寓意在于告诫人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出身,人始终是一个特定具体时空之中的肉体存在,人是有限度的。在翻译这本书之时,我越来越赞同伊格尔顿的这种理解。对于我来说,翻译也是有限度的,无论我如何竭尽全力,却总是难以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原文的意思充分地传达出来,这使我常常陷于一种焦灼不安的痛苦状态,对自己能否胜任翻译工作产生了深深怀疑。不管如何担心和焦虑,我还是坚持把这项工作做完了,在付印之际,忐忑不安的心情并没有消失。钱锺书先生说过,翻译“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如果我的译文能扮演这种媒婆的角色,就超出自己的期望了。

这本书的翻译是一个密切合作的过程,许娇娜、周海玲、王斌、尹庆红和赵子昂几位博士,在繁重的学习和工作期间,主动承担了一些章节的翻译。具体分工如下:许娇娜译了第3章,周海玲译了第9、11章,王斌

译了第2章，尹庆红译了第7章，赵子昂译了第8章，我译了序言、第1、4、5、6、10章，并对全部译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校译和最后的统稿。我对各位师兄妹的鼎力相助和愉快合作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此译著是我们共同完成的，但是，译文中的每一处错误都由我负主要责任。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向我们共同的老师王杰教授表示感谢，这本书是在王老师的主持下开始翻译的，他不仅写了序言，还在联系版权和出版事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帮助。王老师的宽厚正直和可贵的同情心使我明白，正义始终是有价值的，人和人之间还是可以相互信赖的。我也必须向这本书的编辑安新文老师的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致以由衷的谢意。最后，我还要向我的妻子陈春莉女士表示感谢，没有她的无私奉献，这本书的翻译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重点建设学科项目资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强东红

2015年7月

中文版序

当最初计划后来成为《文学之外》这本书的写作时，我为这个项目所设计的题目是“反文学”；事实上，最初就是以这个题目而与出版社联系的。然而，当我着手这个工程时，我逐渐感到这不过是一种反偶像的姿态，这会使我的关注点从我的真实意图偏离。这并非要采用某种反对文学的一般化立场，而是要为书写文学史提供某些定位，它将会参照着文学作为一种特殊书写（一直审美地理解为在本质上与其他书写实践区分开来）的概念，而采用一种批判的外部性立场。在一段时间，我禁不住选择“超越文学”作为一个替代题目，但后来的决定与其相对，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声称超越它们的主题内容的书，通常仍然紧紧环绕着它们意欲替代的模式而运转。而且，对于我来说，逐渐明朗的是，文学并非那种可能超越的事物——确切言之，还没有可能，或者说，在目前还没有可能。后来我决定用“文学之外”来更好地传达我的意图：采取一种处于传统的审美文学观的外部的立场，而建议将“文学的区分性的特性（文学性）定位成一系列历史特定、制度组织化的效果，而不是定位成‘文学’的文本的永恒不变的特性”的一系列方法原则。

不过，在本书的文学观中，“之外”还有另一种意思：即处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的外部，后者将“外部”解释成一种总体化的学术框架，能够无可匹敌地把握我们时代的历史矛盾。这些观念（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批判性自我意识的观念）在20世纪60、70年代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的复兴

的语境和更加漫长的延续的学术传统——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安德森，1976）——中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显而易见，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于1990年的《文学之外》，是在那个时期构思和写作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的框架中，学术思潮正在与这股潮流相撞、竞争，“后马克思主义”尽管承认受马克思主义的恩惠，却寻求取代这种主张。我的意图是促成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主要是通过展示马克思主义者的致力于文学和审美的分析问题的事业，如何把这种分析的目标（文学和审美的特性）很大程度上看成是既定的，而不是通过展示其历史具体性而对其进行质疑。我指出，如果它要作为真正的“革命”科学而在文学和审美领域发挥作用，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应该接受“资产阶级美学”的问题，计划替代地解决它们，而是更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原则，将那些问题看成必须解决的问题，并生成新的替代的问题式。

就此而言，《文学之外》的工程还处于我在一本早期著作《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尼特，1979）所发展起来的观点的连续线路中。该书聚焦于与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文学和审美批评的形式。通过追溯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即，一方面是阿尔都塞式的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批评的形式的观念（它不同于对意识形态及其功能的科学[即马克思]的理解）；另一方面，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作为构成文学文本的陌生化特性的“文学性”的观念，我指出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不能充分地面对写作政治，因为它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已经由于其没有质疑地接受源于更早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的问题式而预先废弃了。然而，尽管两本著作之间具有非常重要的连续性，但是我在《文学之外》的方法已经偏离了《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采用的方法，而更坚决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范畴的解释。吸取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我倡导一系列替代的解释，它将允许重新设计这种问题，而保留调控写作实践的生产、运用和接受的一系列历史的、具体的和

制度化的关系。不过，我必须强调，我不是求助于福柯关于文学和审美主题的论述而获取这类话题的重要灵感，而是借助于他关于真理与权力的关系的更为普遍的论证，而探讨引导和激励的文学和审美的制度和实践的运转的权威（authority）的独特形式。

我不应该预演这本书在这些问题方面的论证，因为这些是中国读者可以自己追寻的——这本书的译本正在其手。不过仍然值得补充的是，我在《文学之外》所开辟的论证线路也是我在随后的著作继续追求的，尽管后者的方向和重点有所变化。特别言之，我借助了福柯著作的其他方面——主要是他关于身体政治学（biopolitics）的演讲和这些给予不同知识分子权威在生产各种各样的自由（由此自由，治理的自由形式得以运行）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以便于重新勾勒审美作为一种关涉着独特形式的自由（这种自由形式，我称之为“被引导的自由”）的有机化的问题，而就是通过这种自由，审美实践与便于主体性和身份的治理的自由政体连接起来。我必须补充，这些并非抽象的连接，而是通过我称之为“文化复合体”（culture complex）的运转，已经锻铸成高度具体、惯例化的制度形式。那么，恰恰就是这种问题，在我看来，需要迫切的、更为具体的关注，如果还要充分理解审美的独特的历史品性的话。

托尼·本尼特

2014年5月于澳洲西悉尼大学

序 言

这本书的写作进行了很长时间，最初是在1983年开始写作的。但是，[i]
由于其他压力，有一段时间我根本抽不出工夫进行写作，有时甚至不得不好几个月将其搁置起来，任其在文件柜里变黄发霉。

这影响了这本书的形式。显而易见，要么必须使这本书的观念与写作环境相适应，要么就完全放弃这个工程，此时，我决定采用松散的结构方式。因此，我没有提供一种章章递进的连续论述，而是力求在每一章讨论相对具体的问题。尽管前两章组成了必要的起点，将这本书讨论的关注定位成一个整体，但是读者将会发现，之后的每一章都相对独立于与之毗邻的章节。然而，总体而言，我还是认为，读者最好按笔者安排的顺序来读。

因为，这本书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意图：那就是，努力提出一种在取向上更加社会历史化的文学分析逻辑。尽管我假定现在大多数人不会反对这种工程，不再需要更为充分的讨论和辩护，但是，我仍然坚信，这种意图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如此容易实现，我的研究就是以此为前提的。即使社会历史化逻辑得到广泛支持，它也常常不能得到充分贯彻，这是因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范畴和手段的强大传统还在产生影响，一不留神，其影响就会不知不觉地渗透于分析之中，从而偏离目标。

部分地出于这种原因，这本书采取了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注进行批判性对话的形式。[ix]
不管这个理论传统有多少缺点，在社会历史的联系中研究文学实践上，它仍然是最充分发展和最基础深厚的理论化传统。事

实上，我最初的目的就是想提供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修订本，它将更好地装备，以便实现社会化和历史化的雄心。但是，在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清楚的是，提供某种框架来构建兼容并包的社会历史化的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不再可能得到支持。因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意图，所以我的论述在观念上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然而，并不是说就一定要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毫无疑问，要抛弃一些顽习痼疾），而是为了更加选择性、局部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与范畴。

尽管我希望这些有助于读者对这些论题的判断，但可能收效甚微。比较有效的办法可能是，勾勒一下这本书的结构原则。在第一部分，我概要地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主要依据它们与作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非常普遍的成问题的层面（problematic aspects）的关系来进行论述。每个章节聚焦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论争的特定区域。第二部分的章节，主要讨论困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形式的社会决定观的棘手问题。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美学的特性的理论相联系的问题。第四部分，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同时论述为什么这种批评观难以支持超越宏大姿态政治学的理由。

在讨论这些论题时，我无意提供一种兼容并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史，也无意在所有细节上区分它的各种亚分支。难以否认，每个分支的思想都是重要的，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是有所差异的，但我更想做的是，认证那些困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模式的困难。我也无意依据它们与竞争文学理论体系的关系，来全面评估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理论的贡献。而是，我借鉴了这些激烈争论的关键，常常将其作为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表述的批判性视角或替代选择的方法。读者也会发现我的论证里（经常机会主义地）充斥着取自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和福柯学派理论的观点，但我无意将这些立场融为整体，或者利用它们（和乐意让它们）全面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我所进行的研究也列出了反对这类理论化的原因。

在写作这本书时，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刚开始研究和撰